

【文学研究】

# 乱世之低吟 盛世之战歌

## ——魏晋田园诗与盛唐边塞诗之比较

陈敏直

(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4)

**摘要:**从时代、诗人、诗风等视角对魏晋“田园诗”和盛唐“边塞诗”进行了比较,认为田园诗是魏晋“乱离之世”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儒士无奈的悄声低吟,边塞诗是唐代“开元盛世”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战士”高亢的战歌;前者是苟身全性的消极逃避而后者是百折不挠的积极进取,是盛唐精神的典型体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关键词:**文学;乱世;田园诗;盛世;边塞诗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6)03-0082-05

## Pessimistic and optimistic expressions in poems of different periods

### ——Comparison of lyrics in Wei & Jin Dynasties and frontier poems in early Tang Dynasty

CHEN Min-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yrics and frontier poems in their eras, poets and their styles. The author assumes that the lyrics in the specific period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TAO Yuan-m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present the motional and anxious impressions, and the frontier poems while GAO Shi and CENG Sen as representatives in early Tang Dynasty, present all the society optimistically in struggle. The both periods of poems are opposite in styles and contents, negatively and positively, which means that the periodical writings were originated from exact time periods.

**Key words:** literature; disorderly period; lyrics; splendid period; frontier poem

## 0 引言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sup>[1]</sup>可见,文学的发展与演变除了自身的规律外,总是和特定的时代、世情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其代表作家的心态、性情、际遇,也有着似乎偶然、确为必然的契合。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种文学现象值得深思:一种题材、风格的诗派为何出现在某一

特定的历史时期?例如“田园诗”出现于魏晋时期,“边塞诗”形成于盛唐时期,白话小说产生于宋元时期,长篇小说鼎盛于明清时期。

本文将魏晋的“田园诗”和盛唐的“边塞诗”作一比较。产生于魏晋由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学界对此看法比较一致;而对于“边塞诗”的界定,古代文学研究者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本文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边塞诗”是指盛唐时期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作。正如《诗经》也写“农事”,但很难将它和“田园诗”相提并论,只有到了盛唐时期,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诗人,以边塞风光、沙场征战为题

材,表现了昂扬进取、百折不挠的盛唐时代精神,呈现出慷慨豪迈、积极乐观的诗风,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诗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边塞诗,即本文所指的“边塞诗”。

## 1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乱世与盛世

其实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作品与流派总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体现时代的变迁对个人命运、精神历程的影响,又以个人的具体际遇和心灵历程的轨迹反映时代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田园诗”与“边塞诗”产生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一个是魏晋,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乱世”;一个是开元盛世——盛唐时代,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的巅峰。

“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将田园题材引入诗坛的陶渊明所生活的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期动荡的“乱世”。桓玄、刘裕两个军阀的争斗与征伐,构成了这一时代政坛的基本格局,他在这两个人手下都做过官。桓玄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凭借其父的威望,利用当时皇室和士族之间的矛盾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公元398年终于成为士族反对晋室的盟主。公元403年(晋安帝元兴二年),桓玄篡夺了帝位,改国号为楚。刘裕是新起的军阀,借讨桓玄为名起家,打败桓玄爬上皇位,疯狂残害异己。

陶渊明出仕,适逢残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加之门第森严、士族横行,传统儒士的理想追求很难实现。

有学者认为,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百家争鸣”,争鸣者不会受到残害,而魏晋是一个文人受到空前残害的时代,他们往往因言致祸,招来杀身之灾者比比皆是。从魏晋到南北朝,王朝频繁更迭,社会上层争权杀伐,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大多卷入上层政治漩涡,名士们一批一批地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范晔、裴頠、谢灵运——这些当时堪称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残杀的,这是一个文人受到空前残害的恐怖时代。

魏晋的文人名士讲真话极难,一不小心就会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断送了性命。魏末诗人阮籍就经常以醉酒而躲避祸害,谢灵运走向“山水”,陶渊明则步入“田园”。

对于乱离之世文人名士的处境,陶渊明看得非常清楚。白居易的《访陶公旧宅》诗中说:“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sup>[2]</sup>陶渊明采取了一种政治性的退避,而且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走向田园。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全身、避祸、寄托精神的最佳境界——田园。虽然归隐田园,但他毕竟是陶渊明,不是一个普通的耕田人,正如鲁迅所说的“陶潜(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也不能忘掉‘死’”。精神有所寄托或转移就要写诗。“田园诗”是魏晋时代精神的折射。

和“田园诗”相反,“边塞诗”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繁荣辉煌的顶峰——盛唐时期。

从唐玄宗到唐代宗登基,即公元712年到762年这半个世纪,历史上通常称为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唐朝国力空前壮大,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唐朝的繁荣与强大,使文人有了一种豪迈浪漫的精神气质。对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兼容,文化政策开放注重现实,而不过分囿于抽象的哲学理念与名节。唐代文人、尤其是盛唐诗人的心态呈现出恢宏、富足与圆润,不像宋代文学半壁江山下“凄凄惨惨凄凄”的哀音。盛唐诗人乐观与豪迈是时代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对文人影响最为直接的还是唐代用人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举措体现在朝廷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推行科举制,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宰相大多是科举出身,这无疑给出身低微的文人开辟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实现远大抱负的路径。难怪唐代文人在作品中跃跃欲试,洋溢着豪迈的自信与潇洒,他们的精神面貌比魏晋诗人充实而健旺。“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许多文人共同的风尚。

唐朝扩张疆土的军事活动是边塞诗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唐朝军事势力极强,有足够的实力解决边疆地区和民族矛盾。军事活动加之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边塞生活渐渐关心,对边塞的知识也丰富了,他们对边塞不仅不感到荒凉可怕,而且还感到新奇。许多文人也将立功边塞当作求取功名的出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高适和岑参。

高适和岑参同是生活于盛唐的边塞诗人,二人皆出身低微,都想立功边塞功成名就。他们长期从戎、生活于边塞,对边塞的感受、体验、观察最为深刻而真实,他们的边塞诗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同那

些身在朝阁、养尊处优,摹写“边塞”的“无病呻吟”的诗作有着本质的区别。

“边塞诗”之所以形成于盛唐时期,首先是这个时代是一个与田园诗产生截然不同的时代,其次是文人立功边塞的时代风尚。没有强大、充满昂扬时代精神的盛唐,没有唐朝的用人制度,没有像高适、岑参这样一批豪迈的“寒士”,就不可能产生“边塞诗”,更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边塞诗”。

“田园诗”与“边塞诗”产生的背景,一个是乱离之世文人难以施展抱负,且受到空前残害;一个是封建社会辉煌的巅峰,文人受到空前重用。一个是曲折地传达魏晋人带有悲剧色彩地无奈隐遁;一个是盛唐昂扬时代的精神氛围里,文人驰骋边塞高亢的战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 2 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儒士与战士

高适出身贫寒,以种田为生,曾三次奔赴塞外从军,后来成为盛唐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军事人物。《旧唐书·本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sup>[3]</sup>,向往立功边塞,看不起白首穷经的儒生。他在《塞下曲》里豪迈地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sup>[4]</sup>

岑参虽为官僚世家子弟,但他出生时已是家道衰落,幼年家境孤贫,从兄受学。他曾两次奔赴边塞,在北庭、安西等地生活了六年之久,后官至嘉州刺史。他青年时立功边塞之气概颇为豪迈,《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可以为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田园诗”与“边塞诗”的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作者的不同身份、生活阅历。陶渊明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恪守儒家人生信条的封建文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士”;而“边塞诗”的代表作者、盛唐边塞诗的开创者高适、岑参,他们既是“文人”、“儒士”,又和以前历代文人截然不同。他们亲赴边塞驰骋沙场,那种游侠豪迈的气概已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心态。他们是“文人”,更具有“战士”的胸怀,具有豪迈、乐观、慷慨、百折不挠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困难逆境面前,绝不轻言上天、入地、寻道、归隐等看似高洁,实则脆弱无奈、逃遁、强作儒雅的话。他们是“诗人”,更是“战士”,他们的边塞诗是驰骋疆场的战士的境界与胸怀。两种不同的心态、性情,反映在诗歌中就是两种不同风格,给人以不同的影响:消极退

隐、虚幻的心态平衡,使人逃遁;积极、进取、乐观豪迈的精神状态,令人奋进!

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看不起书生,岑参在《送李副使赵碣西馆》中说到:“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银山碛西官军》中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中国文学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诗人从戎”。唐朝以前,似乎“文人”就是“文人”,他们可以“学而优则仕”,做官大都是做文官。曹操父子,恐怕首先是政治家、军事家,其次才是“文人”。这个例外带来的是建安文学的“慷慨与力度”,这也更证明了作家的阅历不同,带来的不仅是题材、风格的不同,更是一种心态、精神境界的不同。像孟浩然终生未仕,恐怕也才有那份寂寞的悠闲去品味:“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无法感悟驰骋沙场的豪迈与悲壮,无法从“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中感悟出豪迈之美。至于像刘备、孙权,偶然写篇文章,那不算“文人”,至少不是文学史上的名流。

唐代的科举制度改变了出身中下层社会知识分子的命运,使他们能够从戎边塞驰骋沙场。这些来自社会下层、对社会了解本来就多于魏晋及其以前知识分子的“文人”,更开阔了胸怀,对生活有了更多的亲身体验,改变了传统书生柔弱的心态与性格,也带来了诗坛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于题材、风格的变化,从而使唐代文学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一种走出“经学”、“名节”羁绊,走出文人脆弱的平衡自我心态的轻吟与哀叹的诗作,具有慷慨豪迈、豁达、乐观的精神内容,感受真切而富有“力度”的文学作品。像宋代的陆游、辛弃疾、陈亮等都清晰地显示了“诗人从戎”带来文学创作的重大变化。

田园诗是陶渊明身处魏晋乱世,经过痛苦的人生抉择之后,为精神寄托寻找出路所表现出一位“儒士”的悄声低吟。

边塞诗是高适、岑参适逢盛唐,在高昂的时代精神激励下,“战士”从军边塞、驰骋沙场、豪迈高亢的战歌。

## 3 应物斯感,感物吟志:逃遁与进取

进一步对陶渊明的“田园诗”和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史上的“田园诗”,无论是初创时期的魏晋,还是追慕陶渊明后起的唐代名流孟浩然、王维等,从作家的心态看,无一不是面对现实、无奈消极地逃遁;与此截然不同而唐代“边塞诗”却处处体现了诗人积极入世、百折不挠、

乐观进取、高昂的奋进精神。

陶渊明于公元406年归隐之后，写了五首《归田园居》。诗人从官场回归田园故里，逃脱了官场羁绊，远离了祸害，觉得分外惬意。诗中细腻地描绘了纯朴、幽美的田园风光，充分流露了诗人由衷的喜悦。这里八九间草屋，桃红柳绿，鸡鸣狗吠，缕缕炊烟，淳朴、宁静、自由、闲适，这是诗人经历过官场的险恶、欺诈后独到的内心感受。我们在欣赏田园风光诗意美的同时，更要清醒地看到魏晋南北朝乱世中文人、名士往往难以全命，耕耘劳作的百姓备受离乱之苦。这如同《桃花源记》一样的理想境界，寄托精神的乐园，是诗人无奈地躲避与逃遁的精神境界而非社会现实。

正如《晋书》所认为的，隐士是避世的智者，他们为了远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漩涡不得不厕身山林。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田园诗人歌唱隐逸生活显然不是恋上那微薄的物质生活，或有离群索居的孤独癖，而仅仅是企慕那萧条高洁的精神。所以，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归隐先得有吃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就连“隐”也隐不成了。

即使这种逃遁，也是要有条件的。《晋书·隐逸传》所载：隐士孙登要挖土窟而居；董京行乞于市；公孙凤冬天只能披着草衣。陶渊明可算是隐士之中的佼佼者。

陶渊明将田园生活描绘得令人神往莫过于《饮酒》第五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那种自由、闲适、恬静与飘逸的神采，令多少后代文人失意时神往，也形成中国传统文人有一种傲视世俗、以己为高洁、以世俗为污浊的心态。这影响了后来不少文人，甚至影响到一种民族文化心态，一遇到不顺心失意，就去寻找精神世界中的“世外桃源”，其本质是一种消极的逃遁。

陶渊明自己似乎也没有“悠然”到底，在《杂诗十二首》中写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白居易认为：读陶（渊明）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们无意苛求古人，让陶渊明像“荆轲刺秦王”一样，毁灭于魏晋。这说明文学作品是诗人某一特定时代一种心态的流露，切勿将其凝固化；它是流动的精神，勿要将其孤立地看作永恒的东西，而以高尚、世俗分其高下。

田园诗选择的题材，也吻合了逃遁者的心态，所

描写的景物、刻画的意境颇具和谐之美，且赋予田园诗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诗人在对“一丘一壑”的吟玩体味中，使自然之物获得独立自足的地位，而与诗人心灵上的自足相融洽，成为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合适的外在显现。而边塞诗则是另外一种文化心态的展现。

高适的《燕歌行》写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要从边塞荒凉绝漠的自然之境发现美，感受美，描写出美的意境，需要英雄的胸怀和情感；否则，恐怕只剩下哀怨与凄惨了。岑参在这方面堪为典型，他的几首代表作可以说明这一点：《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写道：“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道：“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边塞飞雪的奇景被诗人描写成洋溢着令人惊奇的无边春意。

边塞恶劣的环境，飞沙走石，诗人在作品中让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乐观、豪迈、昂扬、慷慨的精神，受到的是令人鼓舞、积极奋进的情感体验。

对奇异的边塞景色描写，更体现了岑参边塞诗的浪漫主义色彩，《火山歌送别》中写道：“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天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高适的送别诗也写得豪迈动人，如《别韦参军》：“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又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很少受当时盛行的佛、老思想影响，就是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他也不曾想到要“求仙访道”，或“面向空门”。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高适“不使酒骂座，不故为隐遁自放之，不说什么上天入地，不落边际的话，他是一位人世间的诗人”。因此，失望、挫折、压抑、冷落并没有动摇高适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和抱负而积极追求的决心。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雄健昂扬、热情奔放的乐观情绪。《送田少府贬苍梧》：“江山到处堪乘头，杨柳青青那足悲！”史学家评论他：“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君子哉！”<sup>[5]</sup>

## 4 结语

中国文学史上的“田园诗”与“边塞诗”同是以自然景物作为诗歌描写表现的主要题材,但两者却有本质的区别。通过比较,我们认识到两种诗派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不同的人生处世态度,它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sup>[9]</sup>。隐逸文化心态容易很自然地将儒家人生信守和道家的无为哲学、佛家的空寂观念糅合在一起,以“田园文化”为寄托对人生进行超越现实的思考。我们当然期望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民族精神和心态中更多些高适、岑参“边塞诗”所体现的盛唐精神,使我们多些面对现实昂扬慷慨、积极进取、乐观、浪漫、百折不挠的盛唐精神,少些隐逸与逃避、少些在幻想的理想境界中寻求寄托的民族脆弱的文化心态。同时,也让我

(上接第77页)

们清楚地看到,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揭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文学创作规律。

可意见书方可在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这种新的许可模式缩短了审批时限,方便了相对人,提高了办事效率与质量,也确保了卫生许可工作的廉洁高效。当然,这种模式有赖于许可双方的诚信,有赖于行政主体的事后监管和被许可人履行承诺的良心和善行。任何制度或模式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创新却一直都是值得赞赏的。因此,在城市建设领域,无论是否实行行政许可,探索更为完善和有效的管理模式,无疑都是很有必要的。

## 4 结语

鉴于城市建设领域中行政许可的构建成本、实施成本和监管成本较高,《行政许可法》须将部分权力返还给市场自己调节。在继续保留的城市建设行政许可项目中,要大力倡导公众参与,适时适度地公开相关信息,健全和完善听证制度、公众评价制度;对保留、调整、新设许可的项目,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对行政许可中的重大失误,要通过责任追究制度予以矫正,并警示后人。总之,要综合运用城市建设管理方法,审慎采用行政许可手段。

### 参考文献:

- [1] 李文云.“卡特里娜”为害甚烈[N].人民日报,2005-09-07(7).

### 参考文献:

-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 [3]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 [4] 孙钦善.高适岑参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5] 赵宗福,袁宏军.论仙乡传说对唐传奇《柳毅传》的影响[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4):82-85.
- [6] 王庆卫.从“气韵”看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性思维特点[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2):68-72.
- [2] 张孟军.大禹治风可从容[N].科技日报,2005-09-06(2).
- [3] 杨景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草案的说明[N].法制日报,2002-08-24(5).
- [4] 汪慧,沈瞿和.行政许可的经济成本分析[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3,20(1):74-78.
- [5] 刘巍.行政许可法对地方立法的影响[J].现代法学,2005,15(1):173-180.
- [6] 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M].苏颖露,陈少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 [7] 湛中乐.行政许可法实用解答[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 [8] 理查特·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9] 郗建荣.环保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出台[N].法制日报,2004-08-09(2).
- [10] 田文生.重庆重大建设项目须经听证[N].中国青年报,2004-09-06(2).
- [11] 袁曙宏.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理念和深刻影响[N].人民法院报,2004-04-24(3).
- [12] 季哲.简化环保审批程序,省环保局取消8项行政审批[N].南方周末,2004-09-24(8).
- [13] 戈世平.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根本转变[J].华东经济管理,2004,14(2):33-36.
- [14] 应松年.行政许可法与政府管理转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21(4):40-44.
- [15] 刘素平,倪慧娟.浅谈告知承诺制在卫生许可工作中的运用[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4,28(2):51-52.